再论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

戚 其 章

Li Hongzhang played an important and complex role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During the war he was in a crucial position to determine Qing success or defeat. This writer has thoroughly analyzed Li's attitudes and behavior toward Japan before the war and toward the question of peace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at Shimonoseki. He advocated a policy of appeasement on the Korea question before the war. During the war his policy of seeking peace through war became one of simply suing for peace and throughout the peace negotiations. his efforts to avoid the carving up of China on all sides finally ended in failure.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failure was that he and those around him did not understand Japan or the world situation. They did not pursue the war vigorously and instead placed their hopes for peace with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great powers.

十年前,当甲午战争九十周年之际,我写了一篇题目《正确评价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的文章①,对否认李鸿章为主和派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后,又将自己的这一看法写进了《甲午战争史》一书。台湾学者吴圳义先生在一篇长达两万余字的书评中对拙作提出了异议。②可惜吴先生未能运用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主要是认为蒋廷黻先生和郭廷以先生与笔者有"不太相同的看法"。因此,我感到还有再进一步申明个人观点的必要。

一、战前在对日政策上的态度

李鸿章确实是一位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在甲午战争中集军事、外交于一身,表现是多方面的。本文仍按甲午战争的进程分别论述,以期把握住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基本倾向和表现。

甲午战争爆发以前,当日本大举派兵进入朝鲜、并采取步步紧逼政策时,李鸿章对其侵略野心是有一定认识的。当然,李鸿章的这一认识是有限度的。他断定日本"以重兵挟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然仅此而已。他尚未料到日本会真正借朝鲜问题发动侵略战争,更完全没有想到日本会趁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才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驳辨勿怖。"③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在同日本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中,才会愈来愈陷入被动境地。

应该说,李鸿章在中日交涉中起初所持的原则立场,是正确的。当时,鉴于朝鲜政府希望中

国，"撤兵、解倭急"，而日本驻朝公使大乌圭介又有"华撤兵，伊即同撤"之语，于是他一面嘱请清军主将叶志超"整理归装"，一面指示袁世凯与大乌"约定彼此同时撤兵"。④此其一。其后，当日本抛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时，李鸿章又支持驻日公使汪凤藻的关于"中倭皆不干预韩政，惟劝韩自行清厘"⑤的意见。此其二。对此，是应该加以肯定的。所以，我曾说过："李鸿章保全和局的想法不见得全错，是无可厚非的。"⑥吴圳义先生说我不象郭廷以先生那样"并未十分苛责李鸿章"，并不符合事实。

如果对史实进行深入分析的话，便不难看出，李鸿章尽管在对日交涉中坚持了原则立场，却未能洞察日本的奸谋，进而及早采取相应的策略。其实，日本挑起战端的决心早就定了，是决不会从朝鲜撤军的。用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话说，就是"自该处空手回国，不仅极不体面，且非得策。"⑦日本之所以还要同中国讨论双方共同撤军问题，不过是虚与委蛇，赢得时间以寻找挑起战端的机会而已。以后，日本政府在抛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的同时，又秘示大乌圭介："作为延迟我军撤退之理由，阁下可用最公开而表面上的方式，即派遣公使馆馆员至暴动地方进行实地调查。而上述调查，务令其缓慢进行，并使其调查报告书故含适与和平状态相反的情况。是所至盼！"并明告："无论使用任何借口以使我军留驻于京城，最为必要。"⑧真可谓机关算尽！显而易见，日本的目的是，既要日军死赖在朝鲜不撤，又要想方设法拖住赴朝清军，以制造对中国直接开战的借口。李鸿章对日本挑起战争的决心缺乏正确的估计，一厢情愿地希望日本撤兵，而这种决无结果的谈判只能贻误时机，最后落入日本所设的圈套。不能不承认这是李鸿章的一个失误。

曾经有人说，李鸿章不是"纯粹的主和派"。我在十年前所写的那篇文章里提出了异议。现在看来，这个提法倒是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可以说李鸿章不是"纯粹的主和派"。那么，战争爆发前的李鸿章究竟应该归于哪一派？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显然，将李鸿章划为主战派是不行的。当时有不少官员提出，应急治军旅，对日示以必战。如太仆寺卿岑春煊称："为今之计，与其后日添防，老师匮饷，靡有穷期，何若今日临以大兵，示以必战？"⑨礼部右侍郎志锐亦称："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衅之端。"⑩翰林院修撰张謇甚至认为："此时舍大张旗鼓，攻其所必救，则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⑪这些主战言论未必完全可行，但要求在军事上争取主动还是正确的。可惜李鸿章皆与之意见相左。

光绪皇帝对朝鲜形势极为忧虑，多次谕令李鸿章加强战备：

> 6 月 25 日谕："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以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急迫。……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着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⑫
>
> 7 月 1 日谕："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业已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李鸿章老于兵事，久著勋劳，著即详细筹画，迅速复奏，以慰廑系。"⑬
>
> 7 月 16 日谕："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⑭

对于 6 月 25 日和 7 月 1 日两次上谕，李鸿章仍未迅速行动，积极进行部署。直到 7 月 16 日的

严旨下来，他才开始增派援军赴朝，则已事事落日人后着了。可见，确实不能把李鸿章划为主战派。

那么，称李鸿章为主和派行不行？好象也不行。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主和派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他默察朝鲜形势，认为实行战略退却是为上策。7月10日，他向直隶提督叶志超建议，速请“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并致电李鸿章称：

> “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⑮

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若此建议能被采纳，则不仅可改变中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处境，而且亦将在政治及外交方面赢得主动的地位。对于日本的侵略计划来说，必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李鸿章却未能采纳此策，错过了这次实行战略退却的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后来张謇曾批评李鸿章“败和”⑯，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此时的李鸿章自然算不上主和派。

李鸿章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不认为日本会真正的发动战争。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在军事上争取主动，因为“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⑰直到日本发动战争的前几天，已经有数日内日本即将开战之传闻，他仍然认为：“开仗之说似是谣传。”并指示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绌。切记勿忘！汝勿性急。”⑱

李鸿章之所以相信日本不会开战，主要是因为他对俄国的插手干涉抱有太大的幻想。最初，当李鸿章请俄国公使喀西尼转电俄国政府进行干涉时，喀西尼满口答应，并称：“日内即致电，想外部亦同此意。”李鸿章信以为真，即电总理衙门：“素稔倭忌英不若畏俄，有此夹攻，或易就范。”⑲稍后，喀西尼又派参赞巴福禄面告李鸿章：“俄皇已电谕驻倭俄使转致倭廷，勒令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会议善后办法。如倭不遵办，电告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⑳言之凿凿，更使李鸿章信之不疑。其实，干涉云云，仅是喀西尼的一己之见，并未得到俄国政府的批准。可是，李鸿章一直不放弃对俄国干涉的幻想。7月18日，他致电驻俄公使许景澄称：“初盼议成，倭忌俄，暗嘱英居间，俄益忌英，并未议妥。望赴外部声明，托俄系国家意，或更出力。”到7月23日，即丰岛海战的前两天，竟然还电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㉑可见，他对俄国干涉的幻想是始终不悟的。

李鸿章一面指望俄国的干涉，一面又同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进行秘密接触。他派伍廷芳和罗丰禄密访荒川，要求荒川将李鸿章希望和解之意转告日本政府。7月22日，朝鲜形势已相当紧急，他又让人转告荒川，他已决定派罗丰禄作为他的秘密特使前往东京，与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商谈事项。表示衷心希望能够和解，并安排好就朝鲜问题开始商谈。还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之前，驻朝日军不采取敌对行动。24日，陆奥宗光复电表示“不特别反对罗丰禄来日本”。㉒然而，罗丰禄正准备东渡之际，丰岛海面日舰的炮声却中断了中日之间的这场秘密交涉。难道罗丰禄赴日就有消弭战端之法吗？原来其法不是别的，就是以银赂日。吴汝纶《复陈铭书》称：“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并特别指出：“以上所言，皆某所亲见。”㉓是时吴汝纶正在李鸿章幕中，而且在对日方针上观点一致，他的话是不会假的。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在对日交涉中尽管有某些可肯定之处，但其基本倾

向却是想采取类似绥靖主义手段来消弭战端，这当然是不足取的。因此，战前的李鸿章既不是主战派，也算不上真正的主和派，姑且借用绥靖主义之语义，称之为绥靖派，似乎较为恰当。

二、战争中对和战问题的基本倾向

日本海军既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军舰，挑起了战争，李鸿章的态度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复电总理衙门称："倭先开战，自应布告各国，俾众皆知衅非自我开。似宜将此案先后详细情节据实声叙。"并提出："汪使应撤回，倭驻京使及各口领事应讽令自去。"㉔就是说，既要声叙日本挑起战端的罪行，又应中断中日两国之外交关系。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表明与日本决裂的姿态。

但是，应该看到，李鸿章之所以有此转变，与当时西方列强的动向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国际形势对中国是绝对有利的。

首先，对英国倡导的"五强联合调停"计划怀有希望。所谓"五强"，是指英、俄、法、德、美五国。这个计划是英国政府在7月上旬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俄国单独插手。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承认："此举实为防御俄国单独干涉之手段。"㉕但是，俄、法、德、美四国各有自己的打算，对联合调停的态度并不积极，实际上此计划已经流产。而在日本挑起丰岛海战的当天，英国公使欧格讷又旧话重提，并且十分肯定："前劝日本退兵和商一节，日本非但不听，且说话更紧，我政府甚为不悦，已电日本。"又称："现在英、俄之外，又约德、法、美三国同办此事，合力逼着日本讲理，谅亦不敢不从。此时说话，总在日本一边用力。我今日即发电我政府，加力催着日本。并往西山请德国钦差回京。令各电各政府同向日本政府说去。此是好机会，难得五国同心帮助贵国。"㉖对于欧格讷的话，无论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也好，李鸿章也好，都对列强联合调停产生了新的希望。

其次，英国在倡导列强联合调停的同时，又提出了中日在朝鲜划区占领的建议，也使清政府感到和解有望。这个建议也是早在战争爆发前就提出来了。其主要内容是："中日两国共同占领朝鲜，双方都撤出汉城和仁川，日本占据汉城以南地区，中国占领以北地区。"㉗其实，这个建议已被俄、日两国所拒绝，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英国政府也就放弃了这个方案。然而，不仅李鸿章还蒙在鼓里，而且连俄、英两国公使也莫知底蕴。7月26日，即丰岛海战爆发的第二天，李鸿章仍兴致勃勃地同喀西尼商讨实施划区占领方案的具体办法。喀西尼问："中日应各退何处？须离汉城稍远。"李鸿章胸有成竹地答称："宜令倭兵退釜山，华兵退平壤，各离汉五百里。"喀西尼竟表示赞成："此最公允。"㉘就在同一天，欧格讷也告诉总理衙门："我今日尚与各国大臣商量，拟请华兵退至平壤，日本兵退至釜山。日本如不听话，各国均不能答应。"㉙所有这些，都使李鸿章等人产生了乐观的情绪。

复次，日本海军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事件的发生，更使李鸿章坚信英国必不肯善罢甘休。当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后，李鸿章认为："至高升系怡和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倭敢无故击毁，英国必不答应。"㉚在他看来，中国得道多助，日本失道寡助，弭止战端，此其时矣。

正由于此，才促使李鸿章在对日方针上发生了转变。他开始想借外交上的优势地位，采取以战促和的策略。他对北路赴援朝鲜的淮军寄予期望，并抱有很大信心。他认为，这些部队皆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凡其力所能及者，当可无误机宜"。并提出："如各军均逼汉城，届时须与各国交涉，再随时请派大员前往督率联络，期有实济。"㉛这时，驻英公使龚照瑷来电称："现倭焰盛，望中获一胜仗，日后公议，中益多。"㉜与李鸿章的想法正不谋而合。他相信清

军会进逼汉城，那时中国转居于主动的地位，再与列强交涉，以促成和议。无论如何，他的以战促和方针含有积极的因素，是不可一笔抹煞的。

李鸿章采取以战促和的方针，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的这个方针又是建立在列强干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尽管日本已经挑起了战争，他同喀西尼的联系从未中断过。他曾派盛宣怀与巴福禄密谈。在交谈中，巴福禄表示："俄国亦不能坐视日本如此之强横。"盛宣怀立即随声附和："吾想贵国此时亦要发兵矣。倘贵国发兵，大约总在元山一带俄、韩边界相近之处。"并转述李鸿章的意见："吾国并中堂之意，均欲与贵国合而为一，将日兵逐出。惟贵国须用兵费甚巨，亦断不能不重为酬劳。"㉝靠贿赂强国出兵干涉的办法来实现以战促和的方针，不仅毫不足取，也有些异想天开了。

事实上，李鸿章所设计的以战促和方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列强干涉的基础上，犹如缘木而求鱼，怎么会有什么结果？列强调停云云，也若镜花水月，渺无迹痕可寻。高升号被沉事件倒是触动了英国当权者的神经，但冷静下来以后，权衡利害，英国政府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转而认为中国应该赔偿高升号沉没的损失。其理由是："由于高升号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后从事向作战地点运送中国军队的工作，而且高升号的英国船长已被剥夺了指挥权，实际上对该船的控制权已落入船上的中国军官之手。所以，女王陛下的政府曾被劝告将赔偿英国国民生命财产损失的责任归于中国。金伯利大臣准备按照贵公司的要求，支持贵公司向中国政府提出合理要求。"㉞这是英国外交部给高升号船主信中的话。由此可见，英国政府是以防俄为大局，视日本为共同防俄的未来盟友，不会因一艘商船被沉而改变此一方针的。这样一来，对李鸿章来说，外交上由似乎有利转为不利，军事上又步步受挫，其以战促和的计划自然要落空了。

李鸿章指望列强干涉虽一直未见成功，但真正的议和却是由他开其端的。8 月 13 日，李鸿章曾向总理衙门报告与巴福禄晤谈情况，称："看来俄似有动兵逐俄之意。该使谓，如何办法，该国尚未明谕，而大要必不出此。"㉟慈禧太后也有联俄的幻想，此电正投合她的心意，不过在当时主战舆论高涨的情况下，不便于明确表态罢了。尽管如此，此电却成为她以后探询和议的张本。9 月下旬，慈禧以清军陆海决战失利，提出派翁同和到天津，探询李鸿章能否设法请求俄国调停。她嘴上说："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事实上，她已打定主意要议和了。李鸿章既知慈禧出面主和，正合乎自己的心意，便告诉翁同和，"俄廷深忌倭占朝鲜，"并保证说："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㊱从此时起，他便在主和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了。

不久，慈禧决定重新起用恭亲王奕䜣，作为推行求和方针的一个关键步骤。从此，她可以内依奕䜣，外靠李鸿章，以推行其求和方针。与此同时，慈禧的亲信荣禄与吉林将军长顺策划于幕后，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取得了一点共识："惟审量彼己之势，默揣当今之局，和则犯千古之不韪，战则尤兵将之不可恃。此中应如何安危定倾，非出自宸断，将无有以轻言进者。"㊲就是说，要推行求和方针，必须让光绪承担和议的责任。慈禧果然施展手段，迫使光绪降心相从 这便扫除了求和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反对和议的帝党终于败下阵去。李鸿章既是主和的始作俑者，他在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阵营中，其作用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于是，清政府便一面公开请英、法、德、俄、美五国出面干涉，一面漏夜商议一件"密事"。所谓"密事"，就是如何派朝廷大臣直接与日本议和，由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亲至天津与李鸿章商谈如何开议，以救燃眉之急。张荫桓带去了奕䜣致李鸿章的密函，内称："此时应如何设法以期了结之处，阁下受恩深重，义无旁贷。且系奉旨归我等数人办理，必可合力维持。"

㊳同时，李鸿章又接到密寄，内谕："须亟筹救急之方，现各国虽允出为调停，深恐远不济急。"这就将派人直接赴日议和之事合盘托出了。李鸿章选中了在津海关担任税务司的德人德璀琳，致函奕䜣云："若令其前往察酌办理，或能相机转圜。否则，暂令停战，以待徐商，亦解目前之急。"㊴后再函称："如果伊藤肯与商量，……或先战，或徐议和，即不烦各国调停矣。"㊵当然，这只是李鸿章一厢情愿的想法。结果，德璀琳到日本后吃了闭门羹，空手而归。

德璀琳虽然碰壁而归，但李鸿章仍然认为惟有派员会议之一法，并需要有皇上"主持于上"。他致函奕䜣建议说："现值事机棘手万分，和议不易就范。顷税司德璀琳自倭回津，鸿章与张侍郎面加询问。据称：从旁询探，所欲甚奢，略如赫德所云。即派员会议，势不能一一曲从。惟既经美使居间，请两国派员商办，此系欧洲通行之例，业与张侍郎商酌，电达总署矣。"又称："闻西例，会议即须停战，除战地外，仍可自运兵械。而停战久暂，其权不能全自我操，须至临时再议。一切固应事宜，只可随机应变。若事有转圜，可期结束，两害相形取其轻，亦万不得已之所为。仍赖圣明主持于上，臣下方有所禀承。"㊶清廷根据李鸿章的建议，决定派张荫桓与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张、邵之东渡，在甲午议和活动中有重要的地位。正由于此，才揭开了李鸿章马关议和的序幕。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知道，李鸿章在战争中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大致说来，9 月下旬以前，他相信列强会出面干涉，而且对援朝淮军抱有一定的信心，因此采取了以战促和的方针；9 月下旬以后，由于军事上节节失利，慈禧又亲自出面主和，他又成为慈禧推行主和方针的得力帮手。尽管有这样的变化，主和仍然是李鸿章的基本倾向。因此，称之为主和派，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三、马关议和前后的表现

李鸿章经慈禧点名赴日和谈后，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一直把依靠列强干涉作为谈判的主要筹码。

当时在清政府内部，主要为割地问题而争论不休。李鸿章感到最为难的也正是割地问题。他在北京期间，曾经一连两天密访欧格讷，意即在此。第一天，他先试探地对欧格讷说："日本来电，中国大臣非有商让土地之权勿往议和。割北方领土会影响俄国，割台湾则会影响英国。中国拟抵制割地要求，是否能得到英国的某种支持？"欧格讷答曰："以个人之见，中国应与日本达成协议，以免出现北京被占领的结果。为了和平，中国值得作出巨大牺牲。"又称："日本之割地要求还不够明确，但必将尊意转告外交大臣。"㊷李鸿章看欧格讷并未采取拒绝的态度，认为寻求英国支持还有一线希望。

翌日，李鸿章又带有一份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起草的《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去密访欧格讷。《草稿》包括四项内容：

> 一、中国同英国建立联盟。英国应确保中国的完整，中国应在英国与另一国作战时帮助英国。
>
> 二、中国陆军、海军、财政及民政管理事务的改革应征询英国的意见。英国将推荐合适的官员由中国任用；中国也有权雇用其他国家的官兵。
>
> 三、中国准备在公允的条件下给予英国臣民以修筑并经营铁路、开发并经营煤矿、铁矿和其他矿山，以及在通商口岸设立并经营各类工业企业的特权。关于铁路、矿

山和内地工厂，中国可在二十五年之后按当时的合理市价收回。

四、中国将本着友好的精神，考虑英国增开新口岸的要求，以及发展商业和调整税收的建议，在不影响岁收的原则下发展对外贸易。⑬

这份《草稿》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变为英国的保护国。欧格讷也正是这样认识的："英国政府应代表中国政府同日本交涉，即英国出面结束战争，挽救中国，使之不丧失任何领土。中国政府为报答这一援助，将实际上在若干年内将整个的国家管理权移交给英国，并由英国独揽改组和控制陆海军、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而且还为英国通商增开几个新的口岸。"⑭但是，此时英国支持日本的方针已定，不会去理睬这份"诱饵"。最后，李鸿章提出派出一名英国使馆人员随同前往日本，也被欧格讷加以拒绝了。

李鸿章与欧格讷两次长谈，为时共达近五个小时，而未取得任何效果，仍不甘心，又急电驻英公使龚照瑗"速赴外部密商托"。龚照瑗往访金伯利，试探说："倭电非有商让土地之权勿往，上意不允；允之，北则碍俄，南则碍英、法。"⑮金伯利颇不以为然，答道："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李鸿章应得到就所有问题，包括割地问题，进行谈判的全权。中国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有可能签订和约显然是有利的。授权给一位全权大臣就割地进行谈判，完全不是丢人的事情。欧洲列强曾有过在战败之后以此为前提求和的事。"⑯其实，此时英国政府已经掌握了日本准备割占中国东北和台湾的情报，金伯利的回答暗含劝中国接受日本割地要求的意思。

在英国公使和外交大臣两处碰壁后，李鸿章还想作最后的一次尝试，就是直接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求助。他电令龚照瑗以呈递国电的名义，谒见英国女王，求其对日本"设法力劝，总以公道议和为望"。⑰就是说，希望英王出面劝止日本割占台湾。但是，英国政府还是拒绝中国公使觐见女王亲递国电，由外交部致函龚照瑗称："为接受政治信件之故，君主接见外国使节或公使，不符合一般外交惯例，也不合乎英国宫廷之习惯。"⑱至此，李鸿章始知在割地问题、特别是割让台湾问题上，指望英国劝阻日本是不可能的，他只得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开始了赴日和谈的艰难历程。

总结以上所述，可以知道，评价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是一个复杂而繁重的任务。但是，无论他战前在朝鲜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战争中从以战促和转向求和的道路，还是马关议和前后为割地问题而奔走活动，都是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西方强国的干涉上，这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同时，尽管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前后有所变化，但其基本的倾向仍是不忘一个"和"，这是不能不承认的。

长期以来，研究李鸿章者颇不乏人。而且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此项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包括蒋廷黻、郭廷以先生在内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例如，郭廷以先生指出："李鸿章自始即竭力避免与日本决裂，外交积极，军事落后，不明日本的决心。所谓外交，只是妄想俄国的相助与英国的调解，而不知俄、英各有怀抱，各有顾忌。"并称："此时李为七十二岁老翁，暮气已深，得失心重，以致举棋不定，进退失据。"⑲这些分析深中肯綮，令人折服，实获我心。而吴圳义先生却从以上引文引出了"在论及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应负之责时，并未十分苛责李鸿章"、"在解释李鸿章对日本一再退让之原因时，颇具同情口吻"⑳，并与拙作有"不太相同的看法"的结论，真是匪夷所思！

但主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史学评论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客观的标准，不能以某一学者的已有结论作为评价的准绳，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我对吴圳义先生的评论表示感谢，但希望

吴先生能够根据史料来详细论证自己的看法，继续写出文章来，异议相与析，为推动李鸿章研究乃至甲午战争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而共同努力。

---

①见《光明日报》1984 年 6 月 13 日《史学》。

②㊿吴圳义：《评〈甲午战争史〉》，见台湾国史馆编印《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十)，第 54 页；第 56、57 页。

③⑰⑱㉔《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 15 卷，第 49 页；第 16 卷，第 10 页；第 16 卷；第 24、25 页；第 16 卷，第 34 页。

④⑤⑫⑬⑲⑳《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13 卷，第 15—16 页；第 20 页；第 25 页；第 29—30 页；第 19 页；第 24 页。

⑥拙著《甲午战争史》，第 32 页。

⑦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第 88 页。

⑧㉒㉕《日本外交文书》，第 27 卷，第 552 号；第 607、608 号；第 658 号。

⑨⑩⑭《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14 卷，第 34 页；第 38 页；第 35—36 页。

⑪《张謇致翁同和密函》。

⑮《中日战争》(六)，第 8 页。

⑯㉓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第 448 页；第 417 页。

㉑㉘㉜㊶《东行三录》，第 138、144 页；第 146 页；第 150 页；第 199—200 页。

㉖㉙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15 卷，第 23 页；第 25 页；第 27 页。

㉗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 4, Sino-Japanese War, 1894, P. 60.

㉛《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16 卷，第 3 页。

㉝《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 107—108 页。

㉞㊸㊹㊻㊽同㉙，Vol. 5, 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 1894—1895, P. 54; P. 244; P. 234; P. 93; P. 107; P. 405、406。

㉟《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 880 页。

㊱《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八月二十八日、九月初六日。

㊲《近代史资料》1962 年第 3 期。

㊳㊵《李鸿章未刊稿》(抄本)。

㊴《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 20 卷，第 56—57 页。

㊷拙著《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第 347—348 页。

㊺㊼《中日战争》续编(六)，第 591 页；第 592 页。

㊾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 272、275 页。